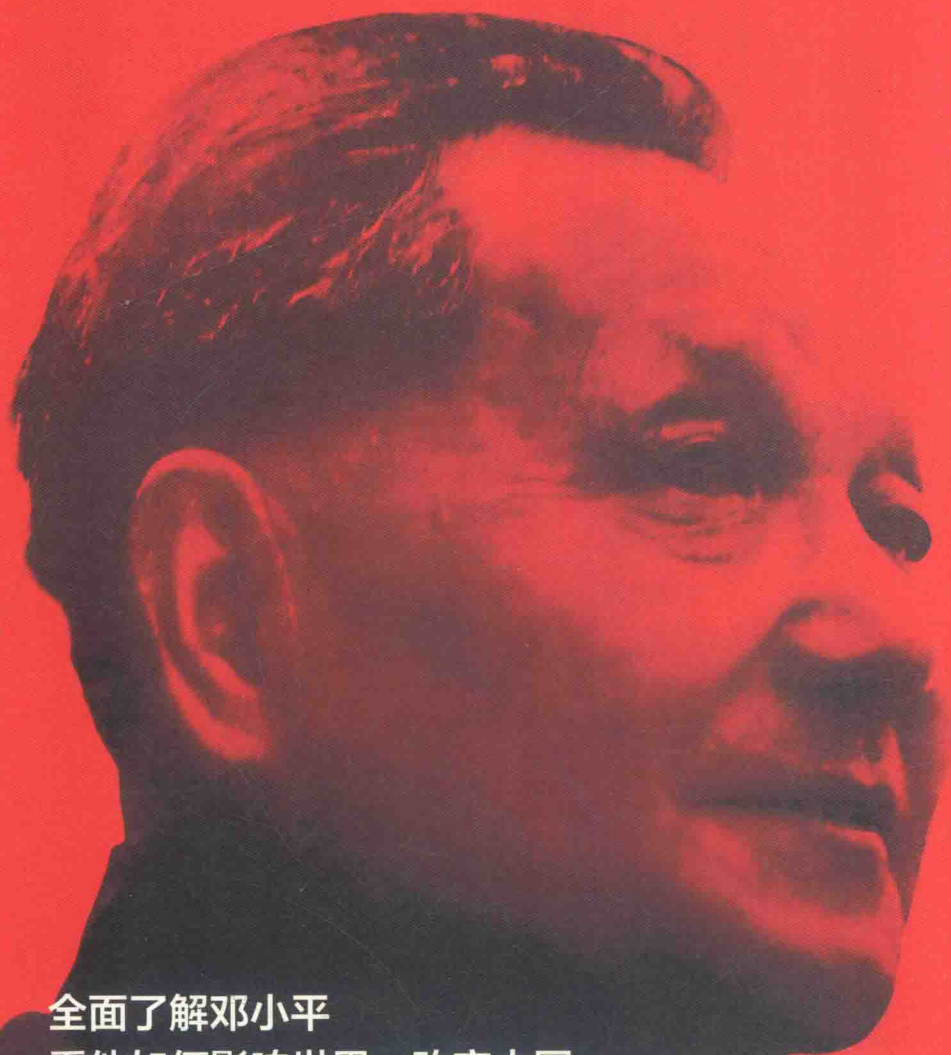


DENG XIAO PING

邓小平实录⁴

1982 — 1997 [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版]

李新芝 / 主编



全面了解邓小平
看他如何影响世界，改变中国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邓小平实录⁴

1982 — 1997

[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版]

李新芝 / 主编

DENG
XIAO
PING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实录 . 4 / 李新芝主编 . —北京 : 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 , 2018.7

ISBN 978-7-5596-2190-0

I . ①邓… II . ①李… III . ①邓小平 (1904-1997)
—生平事迹 IV . ① A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5876 号

邓小平实录 . 4

主 编: 李新芝

责任编辑: 郑晓斌 徐 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2 千字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190-0

定价: 5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第九编 总设计师（1982—1989）

历程

政治体制改革	2
中共十二大	8
中央顾问委员会	12
下苏杭	17
台湾问题	28
香港回归	35
澳门回归	45
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	49
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	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	71
十二届三中全会	75
“863”计划	78
十二届六中全会	81
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	84
百万大裁军	89
中共十三大	94
中苏关系正常化	98

交往

人间重晚晴——与谭启龙	107
支持“荣老板”——与荣毅仁	109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与霍英东	114
关心“宁波帮”——与包玉刚	117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与陈景润	120
不忘老朋友的生日——与爱泼斯坦	124
谢谢你们——与吴健雄等	126
“我知道你比较了解中国”——与布什	130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与华莱士	137
“我们要把好的时期记住，坏的时期忘掉”——与胡萨克	145
“我们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和繁荣”——与穆塞韦尼	149
“我很高兴结交你这位年轻的朋友”——与拉吉夫·甘地	154
“两个德国必须统一，中国同样必须统一”——与施密特	160

珍闻

中国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167
“三个面向”	168
“万里有同心，一年一会面”	169
作出“严打”决策	172
厦门之行	174
为北京饭店题写店名	178
《双猫图》的来历	179
关心南京中山植物园	180
“路子要走得宽一些”	182
“漓江的水变清了”	185
“我回家了！”	189
“看看你们的开发区”	192
接见话务员	195
谈话中的幽默	196

第十编 晚年情怀 (1989—1997)

历程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确立	198
开发浦东	203
南方谈话	207
“要把杭州的旅游业好好发展起来”	228
最后一次视察	231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235

交往

高手之间的较量——与聂卫平	241
“用桥牌来训练脑筋”——与杨小燕	243
唇齿相依，不忘老朋友——与金日成	244

珍闻

离开领导岗位	251
最后一次会见“正规记者”	254
“亚运会建筑搞得好”	256
逛一逛京城	258
和睦的家庭	262
晚年的日常生活	263
《邓小平文选》的出版	269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272
在大海中永生	276

编后记	280
-----	-----

说明	281
----	-----

第九编 总设计师
(1982—1989)

政治体制改革

在中国掀起的改革浪潮中，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难度最大的。邓小平知难而进，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演变而来的，主要是照搬苏联的模式。1956年，我国进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其恶性发展的结果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一场十年动乱的大悲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党酝酿和提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即已开始考虑和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辞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自身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并且指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的问题，并强调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在这篇实际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他更加明确和具体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可见邓小平当时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已有了高度的重视。他提出：“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

就会被葬送。”对此，后来他解释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讲话中，他还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问题作了阐述，如关于下放经济管理权限、加强责任制、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克服官僚主义，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确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作出了一系列决定，主要有：实行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少宣传个人；充分地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把立法工作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从而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到1980年8月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启动，初步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畸形政治体制，但还没有触及根本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和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病有了越来越痛切的感受，表现出强烈不满。

对于政治体制方面暴露出的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极不相适应的问题，在当时揭批林彪、“四人帮”，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没有简单化地将其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是从更深的层面上，即从体制和制度上寻找根源，着手解决问题。

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和探索，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8日，邓小平在会上做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当时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一个专门报告。

邓小平在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讲话对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作了深层次的分析，进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系统而精辟的阐述。例如，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

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他强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还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确定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and 基本思路，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篇讲话发表之后的几年里，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很快全面铺开。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那样：“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其中的原因很多，主要就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更为紧迫，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发轫。同时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敏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党内存在不同意见，要取得一致需要一定的时日。

先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沿着从农村到城市的轨迹迅速推进，仅仅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另外，在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步伐、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已开始遇到新的问题和矛盾，包括与旧的政治体制的碰撞。由于中国过去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是紧紧捆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经济体制改革转为以城市改革为重点以后，政治体制相对滞后的矛盾就自然地日渐暴露并突出起来。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使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必须适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从1986年起，到召开党的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重新成为邓小平思考和谈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1986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他在向客人介绍中国改革的现状和设想时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还包括改革人事制度。这是他继1980年之后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程度比以往明显加强。

自此开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成为他 1986 年谈话的焦点。这一年中有近 20 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 9 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

6 月 10 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并且明确提出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6 月 28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乔石汇报党风工作情况后，邓小平从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再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他甚至由权力下放问题，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关系整个改革成败的高度，他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9 月 3 日，他对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1 月 7 日，他对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在改革过程中，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经济改革到一定时候要提出政治改革。

毫无疑问，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然。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改革实践的准确把握。

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邓小平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但他没有把目光局限于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高瞻远瞩，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的战略高度，放眼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曾说过，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情况就不同了，英国前驻华大使伊文思的评论不无道理：“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邓小平可不是外行。”

1986年，距离党的十三大只有一年的时间，邓小平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通过充分讨论、酝酿，理出头绪，以便能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一个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所以他不仅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将其目标和内容也都明确提了出来。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邓小平说得非常清楚。1986年9月3日，他会见竹入义胜，在回答客人的提问时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9月29日，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邓小平更加明确、完整地概括出总目标为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更富有新意的是关于近期目标或者叫具体目标，这是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谈到的，以11月9日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谈话表述最为完整，他提出：“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实现领导层干部队伍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认为效率不高主要涉及党政不分；“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与长远目标相比，近期目标需要抓住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邓小平所提出的目标体现了这一点。

第一个目标尤为关键，它是提高效率和调动积极性的基础和保证。

增强领导层的活力，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邓小平很早就意识到这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问题。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着重讲过这个问题，而且身体力行，为领导层年轻化做出了表率。他认为，七年多的时间，我们走了几步，但还不理想，现在基本上还是老年化或者叫年龄偏大。因此，到了1986年，他不但更加重视这一问题，再三呼吁，而且从自身做起，恳切地表达自己退休的愿望，带头实践党和国家干部制度的改革。

1986年9月2日，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说，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我正在说服人们，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11月1日，他又对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拿我来说，非改革不行，已八十二岁，还能干吗？该让路了。与我同龄的人有一批，我们在酝酿让位的问题，这一

步非走不行。

在坚决主张包括自己在内的老同志退休，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同时，邓小平毫不迟疑地力主领导层要年轻化，并表现出了很大的决心。10月24日，他在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的谈话中，当日本朋友谈起老一代和年轻一代领导人在年龄上、对问题看法上的差别时，邓小平干脆地说，年轻人思想开放，最支持改革。第二条，年轻人精力充沛，工作效率高。总之，要年轻化，否则没有出路。11月3日，他同美籍华人陈省身谈起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实现年轻化的期限，他说：“中国目前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就不能体现活力。中国只有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他明确提出要花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逐步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几天后，即在11月9日同中曾根康弘的谈话中，他进一步提出具体设想：“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但还不能完成，设想党的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党的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

萦绕在邓小平脑海里的另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从何处着手。9月13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同时，邓小平还特别地提出了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如，改革既要坚决，又要谨慎；不能照搬西方模式，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等等。这对于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健康地进行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从长远目标到近期目标，从具体内容到原则方法，既着眼于社会主义的长久发展，又充分考虑当前的客观实际，显示出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深思熟虑。把这个时期他的阐述与他在1986年前后的有关阐述作个比较的话，完全算得上是完整、准确了。这意味着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这时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从而使我们党不仅开始重新重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真正将其摆上议事日程，而且拥有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明确了方向。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确定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

同时，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和关于目标、内容的设想，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织有关方面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进行专题研讨和论证工作。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论述，还在全国理论界引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讨论，讨论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建议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研讨小组在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一年后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方案，其主要内容写入了中共十三大报告。

1987年10月，中共召开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列入议程，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十三大报告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报告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第一，实行党政分开。第二，进一步下放权力。第三，改革政府工作机构。第四，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第五，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第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第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很显然，中共十三大所提出的政治体制的总体设计方案，完全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

中共十二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近四年的全面拨乱反正和局部改革，促进了我国由“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大转变。各项事业、各条战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在思想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纠正了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思想解放，使各条战线焕发出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在经济上，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调整了国民经济，改革开放起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经济逐步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在政治上，揭批“四人帮”，消除其帮派势力和思想残余，平反冤假错案，落

实各项政策，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逐步调整、整顿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把一批优秀人才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党的组织逐步健全，党的威信不断提高。

这一切表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制定和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国家已经基本消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向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确定继续前进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与此相适应的具体方针政策，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等问题，迫切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1. 审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2. 审议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3. 按照新党章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在会上致开幕词。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回顾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阐明了党的十二大的历史地位，指出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他说，党的七大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党的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党的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对于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现在这次代表大会和‘八大’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教育了全党。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和党的‘八

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开幕词中，邓小平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首次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这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的理论概括。

邓小平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 we 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在开幕词中，邓小平还指出：20世纪80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项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

邓小平的开幕词言简意赅，高屋建瓴，听后给人以力量，使人振奋。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出，解决了我们党在几十年的艰苦探索中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即现代化建设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全部理论思考的主题，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致开幕词后，紧接着，胡耀邦代表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

报告在回顾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程和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后，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的首要任务，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确立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报告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

报告在提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而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解决好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尽快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中共十二大的主要议题之一。

9月10日和11日上午，大会举行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保留了邓小平等6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同时新成立了党史上没有过的中央顾问委员会。

这三个委员会的产生，尤其是顾问委员会的成立，体现了邓小平在《党